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让西方世界更加便捷有效认识中国

□ 翁明源

翟理斯（Herbert Giles）是英国前驻华外交官、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对中国的文学、宗教、历史和社会生活等都有着深入研究，一生致力于研究和传播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翟理斯通过编撰学习汉语的工具书和教材、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传播中国文化思想，让西方世界更加便捷有效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乃至认同中国，打破中西方因语言障碍形成的沟通阻碍与文化隔阂。英国外交官金璋评价其称“翟理斯使汉学人性化了，这是当代任何其他汉学家都未能做到的”。也因此，翟理斯成为第一个荣获皇家亚洲文会金奖的英国汉学家，并先后两次获得被称之为汉学界诺贝尔奖的“儒莲奖”。

1867年，作为英国外交部驻外使馆的一名翻译，翟理斯首次踏足中国。翟理斯先后在天津、宁波、汉口、广州等地任职，一共在中国居住达25年之久。虽是一名外交官，翟理斯却将主要精力与热情投入到有关中国文明的研究与传播上，并将其作为一生的事业。基于在中国的经厉与研究，翟理斯在返回英国后即当选为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在任教的35年中，他将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相结合，终其一生，著写或翻译了超过60部作品。在推动汉学人性化的过程中，他致力于让外国人能识中国文字、爱看中国文学、易懂中国文化，成为观察中国文明的汉学家。

编撰辞典教材,让外国人能识中国文字

文字和语言是认识和了解一个国家 and 民族最直接的媒介，却也常常成为阻隔文化交流的障碍。为了帮助外国人尽快认识中国字、讲出中国话，翟理斯在1873和1878年分别出版了《语学举隅：官话习语口语辞典》和《关于远东问题的参照词汇表》，收录了当时日常交谈和报刊杂志中最常用的术语、书目、俚语、短语，并附有简短解释和溯源性说明，不仅容易上口，更能够了解到中国的具体情况。

然而，仅仅从口语词汇入手并不能真正认识中国字。为此，翟理斯用了近20年时间编撰了《华英字典》。1892年，《华英字典》一经出版便成为外国学生人手必备的日常工具书，被认为是翟理斯一生的最大成就。此后，他又用了20年进行修订完善。为了方便检索和学习，翟理斯改善了“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既符合英语人士的注音习惯，也结合了汉字的书写特点。除了包含13848个单字及其详细释义的巨大体量，该书还囊括了包含中国的官职、朝代、历法、地理等内容的附表，本身就是一本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之作。该书不仅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和西方人学习、了解、研究中国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也对汉英词典的编撰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它之后出版的汉英词典在编撰体例、检索方式和附录设置等方面大都借鉴和沿用它的一些做法，因此它又称得上是汉英词典的奠基之作。

除了学习汉字的工具书，翟理斯还大量编著了学习汉语的实用教材。此前，西方学习汉语的权威教材是威妥玛的《语言自述集》，该书虽然详尽，但是学习方法较为复杂，且只是记录了北京官话体系，不仅不易掌握，在实用性上也有所不足。因此，在学习汉语5年后翟理斯便撰写了《汉言无师自明》，该书使用简单的英语给汉语注音，只收录了当时最实用的简单短句，方便初学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日常汉语会话，成为当时西方外交官、商人、学生等最青睐的汉语学习教材。此后，他又相继编写了《字学举隅》帮助外国学生辨析容易混淆的汉字，《百个最好的汉字》帮助初学者通过少量的汉字掌握最日常的用语。他编写的这些教材，使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变得容易了。

翻译经典作品,让外国人爱看中国文学

翟理斯对汉学的研究是从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开始的。1873年，出于对“（《三字经》和《千字文》）不可能

翻译成英文韵诗”的挑战，翟理斯出版了第一部汉英译作——《两首中国诗》。初次的尝试带来的是褒贬不一的评价，因为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的翻译不仅需要语义的精确，还需要意境的重现乃至韵脚的巧妙。因此，1899年翟理斯重译了《三字经》。在这个版本中，他不仅对诗文中涉及的历史、文化、典故进行了分析、介绍，还按照英国诗歌的习惯对《三字经》进行了翻译，实际上相当于对《三字经》进行了再创作，使得英文读者更能理解《三字经》本身的意蕴。可以说，翟理斯的英文译作不只是简单的翻译再创作，其本身就是颇具文化价值的文学作品，这也构成了翟理斯译作的独特风格，在汉学界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并被英文世界的读者广为喜爱。

此后，翟理斯又相继翻译了《洗冤录》《庄子》《聊斋志异》《道德经》《古文选珍》《古今诗选》等。其中，《古文选珍》收录了中国89个文学大家的186篇作品，向西方世界全面展现了中国文学的瑰丽神奇。

在对中国文学作品大量的研究和推介之后，翟理斯已经对中国几千年文化及人物有了充分了解，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学的历史地位，并尝试用自己的视角来梳理和介绍中国文学的独特风貌。其中的代表作是其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这是第一部英文中国文学史的瑰丽奇书。在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研究和推介之后，翟理斯已经对中国几千年文化及人物有了充分了解，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学的历史地位，并尝试用自己的视角来梳理和介绍中国文学的独特风貌。其中的代表作是其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这是第一部英文中国文学史的瑰丽奇书。在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研究和推介之后，翟理斯已经对中国几千年文化及人物有了充分了解，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学的历史地位，并尝试用自己的视角来梳理和介绍中国文学的独特风貌。其中的代表作是其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这是第一部英文中国文学史的瑰丽奇书。

介绍社会百态,让外国人易懂中国文化

自22岁来到中国，翟理斯在中国连续生活了25年，不仅十分熟悉中国的语言文字和文学作品，也充分了解了

中国文化和社会风貌。他行走中国，遍历群书，广收博览，形成了大量的翻译作品或研究成果，这些作品的专论性质不强，内容松散，但涉猎极广，包括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制度、法律、教育、宗教和哲学的方方面面，对中国的社会生活有翔实的记录。如1905年的《中国绘画史导论》，是第一部英文中国绘画史；1924年的《洗冤录》被西方医学史家誉为“伟大的文化里程碑”，翟理斯的这个译本更被称为“最有影响、最具权威”的英译本。此外，翟理斯不拘泥于严肃的文化翻译和研究。1925年，他出版了《中国笑话选》，通过翻译《笑林广记》中的笑话，打破了欧洲人“认为中国人性情比较郁闷，说中国人好比是斯芬克斯，没有笑的能力”的刻板印象，真实地反映中国社会生活，反映中国男女老少的行为、语言 and 思想。

作为对中国文明的观察，翟理斯写出了著名的“中国文明三书”，即《中国札记》《中国和中国人》以及《中国的文明》。不同于其他译著的简单介绍，翟理斯着力纠正了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错误认知，并提出了许多对中国文明发展的独到见解。例如，面对清朝的覆灭，他指出：“中国会经历熔炉的锻炼，随后重生，像历史上发生过的那样，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纯、更强。”1935年，翟理斯在英国剑桥的家中立碑。在90年的人生中，在中国工作了25年，回国后在汉学教学和 research 上耕耘了35年，为研究阐释和传播中国文化奉献了一生。他的辞典和教材帮助西方世界认识中国，他的翻译作品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他的汉学研究重塑了被西方扭曲的中国形象，对汉学研究的发展乃至中国走向世界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古代生态水利中的智慧

□ 牛志奇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石，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是生命之源、生态之基、生产之要，更是文明之本。中国古代先民特别注重对水的尊重、顺应、保护，在治水用水的千年实践中孕育了相合相生的生态理念。

（一）

自古以来，我国基本水情一直是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古人很早就意识到水资源并非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需要保护和珍惜。《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黄帝观测天文星象，利用水源乃至土石金玉，并要求部落成员要节约用水、火、财物。远古时期对水“用之有度”的保护理念，表达了古人对处理人与水资源关系的重要认识，也充分体现了古人保护水资源的朴素生态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也是与自然生态共生共荣的过程。古人在治水用水具体实践中，逐步摸索总结出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规律，凸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管子·乘马》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管子指出，凡是营建都城，城址的选择要因天材，就地利，靠山近水。如选高地，要有水源保障；若近河湖，则有地形优势，以利排水而省修防之功。城邑营建的位置选择要基于水的自然属性考虑，既考虑趋利避害，防止洪水的威胁，又要充分利用水资源，顺应水的流动规律，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做到与自然 environment 有机结合，达到在利用水资源的同时

有效控制水患的目标。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在古代一些典籍里也有记载。《吕氏春秋·有始览》有云：“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数，风有八等，水有六川……。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这里是说天地间有山脉、有河川湖泊、有土地，天地万物，如同一个人的身体，人与天地本身就是对应相同的。古人将自然界的生态系统比作一个人的身体，看成一个系统，体现“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强调人与自然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人与草木、山水同在。

（二）

在先秦的典籍中，记载了管理利用与保护水资源的生动实践。《周礼》记载了九州的行政区域，同时也一一列举各州的疆域和水资源分布情况，将九州的水资源分为泽数、川、浸三种类型，泽数是人们从事水产和渔业的水域湖泊，川是可以通水运的江河水道，浸特指有灌溉之利的塘泊或河流。这种对水资源的划分，有利于水资源的使用管理，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与保护。《礼记·月令》记载：“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渫，开通道路，毋有障塞。”春天的时候，主管水利的官员要巡视四方，要修缮堤防，疏通渠道，防止堵塞河道，保证河流的畅通，满足百姓对水资源的有效使用。同时，古代先民为了生存和发展，还必须直面水患水灾问题，探索如何与水打交道的水利智慧，合理处理水患水灾与人类生存矛盾，这在一些古代都城遗址中可以看到端倪。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的重要考古遗址——陶寺遗址，是距今4300—39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规模最大遗址之一，位于山西临汾盆地内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塬上，汾河谷谷在陶寺城址以西约4千米处，依傍汾河的支流（南河、宋村沟）。通过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认为，陶寺遗址在选址时充分考虑了城邑对河流的利用，有意远离汾河主河道，以避开来自汾河的水患，并依托南河和宋村沟的水量充沛，为陶寺先民提供充足的生活水源。另外，陶寺都城位于宋村沟与南河之间，可以依靠南河的自然沉降给排水、充分体现了古城选址和水利设施利用自然条件的水利智慧。从陶寺遗址可以看出，古人的城市建设活动充分展示出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水利智慧，不仅保护了城邑，也力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古代的一些著名水利工程还体现了系统治水的理念。在南朝时期通济堰的修筑和管理中，古人注重把水、林、沙等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来对待，统筹水与林、沙等自然生态要素的关系。特别是宋代范成大任处州知州时，专门制定《水则》规定：堰渠两岸不许种植竹子，防止竹子对堤岸的危害；在分水与排沙中注重工程的运用和调度，处理好水沙关系。还建造“水上立交桥”工程，解决山洪冲击与灌溉渠系的安全问题。通济堰的修建，兼顾了水与自然生态各要素间的关系。

（三）

在几千年的治水用水实践中，限制人类活动对水生态的破坏、扰动，加强对水的利用和保护，一直是中国古代水利法律法规所规范的主要内容。

早在先秦的典籍中就有关于保护江河湖泊的法令规定。《周礼》明确记载了虞衡制度：“三曰虞衡，作山泽之

材。”虞衡制度的设立，表明先秦时期的水管理从对山川江河的认知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通过设置专门的机构、职官，颁布有关保护山林川泽的政策法令，规范社会生产活动，约束人们的行为，保护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云梦秦简中的《田律》中有“春二月，毋敢伐木山林及壅堤水”的记载，规定在春季生长的季节，不得滥伐山林，不得堵塞水道，使水流能够畅通，满足农业和社会生活的需要。

汉承秦律，西汉时制定《水令》。《汉书·倪宽传》有记载：“宽表奏开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反映出汉代法律中对水资源的分配管理，解决用水的次序问题，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处理好水资源与其他自然生态要素的关系。唐代《水部式》是我国历史上由中央政府颁布的第一部国家水利法规，其中有专门条款规范不同用水部门的利益关系，如白渠和清渠“恒准水为五分，三分入中白渠，二分入清渠”，还规定如果水量过多，还应该开放闸门，让水退回河道，这些条款都充分考虑到水资源与农业用水的关系，要求合理利用水资源、保护水资源。

宋代《农田利害条约》规定，要重视圩岸和堤防的修筑，防止水患，还要“开导沟洫，归之大川，通泄积水”，反映出宋代保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水生态观。

这些水利典章，既是中国古人生态水利智慧的结晶，又为进行生态水利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



（上接1版）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过程中，不断破除生产关系方面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突出特点。

新发展阶段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需要高水平的改革，特别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推进高水平的开放，特别是“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改革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开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切实增强国内外大循环的动力活力。

就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言，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资源配置上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是建设高标准市场竞争体系，特别是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培育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三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四是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化和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秩序；五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机制。

就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而言，关键是对标高标准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扩大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一是目标导向由比较优势向竞争新优势转变；二是循环模式由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向以内促外、优进优出转变；三是路径重构由产业路径依赖向产业协同创新转变；四是开放类型由政策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从而构建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新优势。

就统筹改革和开放相互关系而言，一方面通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循环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通过深化改革，形成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增长点，以深层次改革推进高水平的开放，以制度型的开放促进深层次的改革。此外，需要统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内外均衡，注重改革深化与制度型开放下的国际宏观政策间的协调，进而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

“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高质量发展题中应有之义便是高水平安全。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释高质量发展主题时指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从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演进趋势上看，越是接近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达成，统筹发展和安全越显得重要。这是由于机遇和挑战的内涵具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机遇更具战略性、可塑性，挑战更具复杂性、全局性，机遇和挑战的相对关系发生了变化，不是简单的机遇大于挑战，而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首先，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前所未有，挑战更具前置性；战略机遇期不再清晰，不能一般地说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而是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其次，国际经济格局深刻变化，世界经济风险系统性上升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冲击，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具紧迫性。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结构性提升，使得我国经济发展无论是在存量还是在增量上对世界经济影响力

显著提升，与之相适应世界经济的风险变化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影响更具深刻性和系统性，统筹发展和安全更为迫切也更为复杂。最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从“十四五”期间实现上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发展目标来看，面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从达成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及约束条件的要求来看，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可持续能力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重点领域安全。”

统筹发展和安全，关键在于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一是切实坚持高质量发展主题，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把高水平安全建立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之上，切实解决经济发展质效提升的“上水平”；二是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解决外国“卡脖子”问题，实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切实解决产业链供应链和能源、科技等方面的“补短板”；三是从大国经济均衡发展规律上看，投入和产出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循环是保障安全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培育健全的产业和经济体系是实现安全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四是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安全必须是高水平安全，“上水平”与“补短板”必须在高质量高水平相统一的基础上协调统一推进；五是高水平安全必须具有全面承受和防范系统性风险能力，对于我国而言，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高水平安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概括的，应包括“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

“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最广大人民，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完成这个使命任务的途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我们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最广大人民，集聚起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新发展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因而是最大的政治。要实现这一使命任务，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规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重要体现。进入新时代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党不断加深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重要的一条便在于认识到党的领导，尤其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客观规律性和重要性。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一方面必须团结最广大人民，中国式现代化是深刻的革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战胜种种艰难险阻，所谓政治的要义就在于此；另一方面践行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心任务，首要任务便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因此要求落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的政治”，我们党必须不断加深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善于运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提高把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能力。（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